

中国当代文学教程

王惠云 苏庆昌 崔志远 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教程

王惠云 苏庆昌 崔志远 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平山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2.125印张 298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5.10元

ISBN 7-80505-353-7/G·10

1982
100

ZHONGGUODANGDAIWENXUE

主 编

王惠云 苏庆昌 崔志远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惠云	方道文	朱柳根
刘晓明	刘瑞彦	苏庆昌
何 纪	张东晖	陈福民
崔志远	韩晓亮	程精棉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潮..... (13)

第一节 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任务的提出..... (13)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文艺思想斗争..... (20)

第三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与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 (40)

第四节 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 (46)

第五节 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左”倾文艺思想的发展..... (51)

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运动..... (55)

第七节 新时期的文艺思潮..... (63)

第二章 小说(一)..... (72)

第一节 “十七年”小说概述..... (72)

第二节 孙犁的小说..... (87)

第三节 赵树理的小说..... (95)

第四节 杜鹏程的小说..... (103)

第五节 周立波的小说..... (109)

第六节 峻青、王愿坚的小说..... (116)

第七节	茹志鹃的小说·····	(125)
第八节	梁斌的《红旗谱》·····	(132)
第九节	杨沫的《青春之歌》·····	(139)
第十节	柳青的《创业史》·····	(146)
第三章	小说(二) ·····	(155)
第一节	新时期小说概述·····	(155)
第二节	王蒙的小说·····	(174)
第三节	刘心武、蒋子龙的小说·····	(182)
第四节	高晓声的小说·····	(191)
第五节	张贤亮的小说·····	(198)
第六节	谌容的小说·····	(205)
第七节	徐怀中、李存葆的小说·····	(212)
第八节	张承志的小说·····	(219)
第四章	诗歌 ·····	(227)
第一节	概述·····	(227)
第二节	郭小川的诗·····	(238)
第三节	贺敬之的诗·····	(244)
第四节	李季、闻捷的诗·····	(251)
第五节	艾青的诗·····	(258)
第六节	李瑛的诗·····	(265)
第七节	公刘的诗·····	(269)
第八节	雷抒雁、杨牧的诗·····	(273)
第九节	舒婷、顾城的诗·····	(281)
第五章	戏剧文学和电影文学 ·····	(285)
第一节	概述·····	(285)

第二节	老舍的《茶馆》	(308)
第三节	田汉的《关汉卿》	(314)
第四节	沙叶新的《陈毅市长》	(320)
第五节	高行健的探索剧	(325)
第六章	散文	(331)
第一节	概述	(331)
第二节	刘白羽的散文	(341)
第三节	杨朔的散文	(347)
第四节	秦牧的散文	(353)
第五节	吴伯箫的散文	(359)
第六节	巴金、冰心的散文	(364)
第七节	徐迟、黄宗英、理由的报告文学	(372)
后 记		(379)

引 言

一、当代文学的分期和性质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它研究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学。恰切地评价当代作家作品，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把祖国的文艺事业推向发展和繁荣，是它的任务。

中国当代文学的产生有一个孕育过程，辉煌的现代文学是其前提。发端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自“文学革命”之日起，便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踏着时代的步伐，艰苦卓绝地奋进；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大革命时期以后“革命文学”的提出，完成了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则是革命的文化先驱用生命和血肉筑成的文学里程碑；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学发展中长期困惑的根本问题，不仅是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经验的总结，而且是把文学推向新阶段的伟大指针，此后出现的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和战火硝烟的解放区文艺，则提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雏形。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大会师，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凯歌声中并肩跨入新时代的门槛，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中国当代文学诞生以来，经历了四十年不平凡的历程。四十年间，它经历几度风雨，形成自己独特发展道路。其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后“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十年。

（一）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年5月）的文学：

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十七年间的文学。十七年文学总框架是1942年以来解放区文学的发展和深化。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开辟出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如果说当时还仅是这个文学时代的序幕的话，那么，到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个崭新的时代便庄严诞生了。第一次文代会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确定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总方向，文学同人民、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创作主体看，无论是战争年代投身于文学事业的老作家，还是建国后从工农兵中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其思想感情都努力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从描写对象看，不论是抒情性作品的情态形象，还是叙事作品的性格形象，不仅以表现工农兵为主体，而且以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目标；从艺术风格看，同工农兵群众息息相通的作家们，呕心沥血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着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49年至1956年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一、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尤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如同和煦的春风，催开了文苑的百花；文艺界批判封建思想意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的斗争，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做好了思想和舆论准备。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沸腾的工厂、火热的农村、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前线，熟悉新的时代、新的生活，辛勤地开垦出一块又一块的文学处女地，创造了一批批真实再现历史和现实斗争的作品，讴歌了闪烁着社会主义精神的新人新事。虽然“左”的思想干扰，也曾给文学带来损害，但文学创作仍蓬勃发展，获得初步丰收，走上初步繁荣。

工农兵文学框架并非僵化不变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它必须进行不断调整。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此后的任务主要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历史任务的要求，使文艺服务的对象、范围和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文艺必须调整自身的结构框架方能保持自己鲜活的生命力。恰在这时，文艺界出现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党的指导方针出现某些失误，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反右倾斗争，以及接踵而来的文艺战线上“反修防修”斗争，都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党又不断纠正自己的失误，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文艺工作的调整，几次发表重要讲话，并主持制定著名的《文艺八条》，又使文学发展出现新气象。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1957年至1966年的文学发展基本保持了繁荣的局面，并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文学发展高潮：长篇小说获得大面积丰收，电影、戏剧、诗歌、散文均得到长足发展。然而，八届十中全会后，我国政治和文化指导思想急剧“左”转，发生了对艺术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一些代表人物的错误的过火的批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损害。

（二）“文革”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学。

1966年5月至1971年，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创作可言。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制定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臭名昭著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他们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贬黜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以来的无产阶级文艺，封存一切中外古典文学遗产，把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文坛搞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虽有八个“样板戏”还在演唱，那其实是十七年间的作品。

1972年至1976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干预下，文学创作有所恢复，出版了少量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刊物。但是，由于江青一伙把持了文艺界的领导权力，文艺创作出现复杂的情况：一部分作品受江青一伙的控制，成为直接配合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相当多的作品受四人帮文艺思想的影响，明显带有帮腔帮调；少数作家在艰难的情况下，采取“合法”的或“地下”的方式，写出一些较好的作品，但也不可避免地带上那个时代的“痕迹”。

此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一起，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同林彪、江青集团展开斗争，影响最大的是天安门诗歌运动，它不仅敲响四人帮覆灭的丧钟，而且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

（三）新时期（1976年10月～1986年12月）的文学：

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序幕、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不仅是对十七年工农兵文学精神的恢复和发扬，更重要的是，它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吸取国外文学的有机营养，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期。这个时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拨乱反正阶段。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不可遏止的热情，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同极左思想作坚决的斗争。虽然有“两个凡是”的束缚和障碍，仍取得可喜的成绩。在文艺理论上，澄清了不少重大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出现，勇敢地揭露了十年内乱的悲剧，提出千百万人民关心的社会问题，引起强烈的反响。第二阶段是欣欣向荣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人民思想的大解放，文艺领域也出现全面复兴和发展的新局面；继“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大潮，标志着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出现显示了文艺工作者们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探索；“通俗文学”的流行显示着新时期文学的多采与多姿。作家、艺术家

们日益关注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追求艺术手法的创新和艺术风格的多样。这一切，将新时期文坛装扮得万紫千红，异彩纷呈。不可否认，当着西方文化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一些人表现了无所措手足，一些人表现了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动摇，出现了无视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也出现了一些低级庸俗的作品，这是值得注意的。

了解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概貌后，我们再从它与现代文学的比较中探讨其性质。

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便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之下，不过，那时主要是理论上、思想上的影响与指引。随着革命文学的发展，逐渐加强了组织上的领导，这种趋势反映了文学服务于人民革命事业的自觉性的日益增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建国后，《讲话》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文艺事业置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之后，党又不断提出发展文艺的方针和政策，不断纠正文艺发展中的偏差和失误，保证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

当代文学同现代文学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质的区别。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一方面，它反映着特定时代的客观生活内容，另一方面，又体现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及其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文学作品不仅反映生活，还要反过来影响生活，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促进或阻碍、破坏作用。据此，要区别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性质，必须考察它反映的思想内容（包括客观生活和主观评价）和所起的历史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生活，表现

的是那个时期人民的民主革命要求，渗透着作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其突出的历史作用，是从总体上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在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伟大斗争中发挥积极的推动的作用，基本属于反帝反封建性质，因此，它是新民主主义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描写的是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体现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热爱之情；中国当代文学在缔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伟大斗争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据此，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当代文学，就其性质说是社会主义文学。它产生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二、当代文学的成就和经验教训

列宁说：“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段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样也适应于文学。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因为它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第一，描写对象的拓展和深化。

同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描写的题材是大大拓宽了。这首先决定于丰富的现实生活。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给社会各领域带来空前深刻的变化，绚烂多采的生活交织着艰难曲折的斗争，有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有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悲剧，又有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无限丰富的生活为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它还决定于创作队伍开阔的眼界。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们，把目光投向生活的诸多领域，从工厂到农村，从部队到学校，从边陲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从历史到今天，都予以关注和反映。过去涉猎极少的题材，诸如工业、少数

民族、国际斗争、老一辈革命家、历史、科学幻想等领域，也都有许多填补空白的优秀作品。新时期引起强烈反响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现象，也都是空前未有。

社会主义时代生活的本质是，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了文艺的根本任务，塑造劳动人民尤其是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也就成为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当代文学正是在这方面取得显赫的成绩，无论是叙事作品的性格形象还是抒情作品的情态形象，都塑造了许多成功的英雄典型。其成功处在于：并没有把他们写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也没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化人物，而是按照生活的复杂性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

第二，艺术风格的突破和创新。

当代文学艺术风格的突破和创新，集中一点，是创造了“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中国建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深入生活，批判地继承和学习我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不仅使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还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形成个人风格，文坛初步形成春兰秋菊竞相开放的局面。虽然，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曾经忽视了对国外文学形式的借鉴，民族特色曾一度迟滞和僵化，但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打开了中国作家们的眼界，他们“采用国外的良规，加以发挥”，不断探索并创造多种艺术形式，借以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促进了民族风格的发展和更新。更可喜的是，当代文坛在民族化大众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为社会称道的流派和作家群。如，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南京剧作家群，探索者作家群，西北作家群等。

第三，创作队伍的发展和壮大。

四十年的风风雨雨，锻炼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顽强勇敢的

作家队伍。这支队伍已是“四世同堂”。一是五四时期出现的老作家，他们曾经为创建新文学立下不朽的功勋，在人民共和国的年代里，仍然进行辛勤的笔耕。二是在我国民主革命的不同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成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顶梁柱。三是新中国建立后崭露头角的作家，他们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各条战线，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走上文坛，以赤诚的心歌礼赞共和国崭新的风貌。不少人在五十年代中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十年内乱再次受到迫害，然而，社会底层的生活增加了他们的生活积累，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新时期重返文坛，他们井喷般的创作放出异样的光彩。这是文坛的中坚力量。四是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作家。他们虽然稚嫩了些，但是有知识、有才华，思想开放，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的朝气。四路大军承接赓续，共聚一堂，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形成一个多层次、有朝气、空前壮大的创作群体。

四十年的当代文学不仅有巨大的成就值得称颂，而且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记取。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文艺同人民生活的关系。

文艺同人民生活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作家同人民的关系。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忠实反映人民的感情、愿望和理想。应当说，这方面的成就是卓著的。但也有偏差。十七年间，往往将作家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理解为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关系，把深入生活简单归结为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束缚了作家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新时期我们鼓励作家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但是，一些作家又否定深入生活的重要意义，出现脱离人民的贵族化倾向。其二，作品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即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问题。周扬说：“无论是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

都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革命现实主义往往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因为它要反映现实的发展前途和生活理想。革命浪漫主义也应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即使幻想小说也不能脱离现实。”^①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应该成为束缚创作生命力的教条；作为一种面对现实的精神，是各种创作方法均需具有的。十七年间，现实主义获得发展，但还很不充分。建国初期的许多作品不乏浓郁的泥土气息和生活实感，但往往有浮光掠影之弊。之后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出现一种“肯定的现实主义”，不少作品回避矛盾，公式化、概念化日益严重。新时期，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新时期文学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由于近年间作家中贵族化倾向的发生，出现了一些脱离生活、面壁虚构、胡编乱造的粗俗之作。这是同现实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

第二，必须正确处理文艺同政治的关系。

文艺和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同为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中，政治是核心，是经济基础的集中表现。它指导和影响文艺的发展，同时，文艺也反影响于政治。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政治本身不是目的，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虽然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它只能是手段，目的只能是为人民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告诉我们：文艺既不是政治的附属品，又不能脱离政治。

新中国建立以来，曾长期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地发生失误，口号本身将政治作为目的已属不

^① 《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确，当时又把政治理解为政治运动，理解为某项具体政策，于是，为政治服务变成了“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演中心”。这种从政策、文件出发的文学作品，往往容易公式化、概念化；同时，一旦某项政策发生失误，文学便会出现非现实主义的倾向；更惨重的教训是，当着林彪、江青们把文艺拴在他们的战车上时，文艺已失去自身，堕落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新时期，党中央纠正了口号的偏颇，科学地规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文艺创作空前繁荣。但是，近年间文艺又出现非政治化的倾向，一些人提出“文艺与政治无关”，“文艺离政治愈远愈好”。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同样是错误的。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关系。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目的和方向。一切文学艺术活动，都必须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离开了这个方向，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是繁荣文艺、发展文艺的极其重要的方法和手段。舍此便难以达到“两为”的目的。因为文艺是创造性的精神生产，容不得任何规范化、标准化；文艺又是一种高度民主的劳动，容不得清规戒律的约束和简单粗暴的干涉。要达到“两为”目的，必须通过“双百”方式；要贯彻“双百”方针，切莫忘“两为”方向。多样化中有主旋律，竞争中有方向感，文学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毫无疑问，我们在贯彻“两为”和“双百”方针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是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将“两为”和“双百”对立起来。一种倾向是强调“两为”而忽视“双百”，而对“两为”的解释又只是“为政治”、“为政策”，于是产生混淆两类矛盾、蔑视艺术规律的教条主义。这种错误倾向，在